



民国文坛探隐

陈福康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程 钢

民国文坛探隐

陈福康 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00 千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22-483-1 / I · 140

定价: 25.50 元

目 录

鲁迅在民国第一天	1
鲁迅最初接触的翻译作品	3
住在鲁迅家的日本少年	5
“左尔格事件”与鲁迅日记失踪之谜	8
大夜·璧月·饕蚊	10
鲁迅和沈尹默	11
圆谷弘的鲁迅访问记	13
鲁迅与田中庆太郎	17
第一本今人辑集的唐宋传奇选	25
《桂公塘》的风波	30
四万万人一戎衣	33
秉炬人归从北极	36
郭沫若与《资本论》	40
郭沫若与《剿闯小史》	44
春风吹绿芽苗	50
郭沫若与沈尹默	54
瀛谈百代传邹子	56
新发现的郭沫若笔名	58

茅公全集误收郑公小说·····	60
替人何幸有蒲牢·····	62
茅盾对两篇小说的批语·····	64
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	68
一个谜团的揭底·····	71
关在左联门外的郑振铎·····	77
中华文献文物的忠贞卫士·····	81
好摘星辰藏袖底·····	87
关于“伯乐”·····	90
《饿乡纪程》与《饿乡记》·····	92
风雨论交二十年·····	95
柳亚子读《倪焕之》·····	99
郁达夫早年佚事数则·····	102
郁达夫的笔名·····	109
胡适撰作春灯谜·····	111
老舍最初两部小说的广告·····	113
《小人物自述》·····	115
《海滨故人》探秘·····	121
王任叔与宁波早期新文学社团·····	124
“孤岛”上的一杆旗·····	125
孙伏园两次停编·····	133
朱自清的《北平消息》·····	135
“彭家煌是我们这边的”·····	137
彭家煌的微型小说《隔壁人家》·····	140
最早记述周恩来诗的人·····	144
胡怀琛论译诗·····	146
齐白石为陈子展治印·····	150
“立此存照”的出处·····	153

“钉梢诗”拾遗	155
“怕出偏门过鲁墟”	157
张学良囚中诗	160
张学良读《鲁迅全集》	163
读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	166
文坛耆宿顾毓琇	171
“风号大树中天立”	174
鲁迅书录《锦钱余笑》	182
鲁迅手书夏穗卿一联	191
“兄弟怡怡”译裴诗	199
《人之历史》的再认识	204
也谈鲁迅和周木斋	215
谈《阿金》	225
《汉文学史纲要》书名应改	232
谈“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	234
再谈“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	238
误会	240
鲁迅茅盾致党中央信是谁起草的	244
周作人是否汉奸	249
有关周作人新“史料”的质疑	252
这条注释太不负责任	257
是“佳话”还是编造?	259
《懒寻旧梦录》献疑一则	262
“幽闭”小考	264
“马郎妇”的用典	267
也说“牠”字的创造者	271
《太白》三义	274
中国本当不止一部《汉文典》	277

“比较文学”的名目在中国	279
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史研究	281
裴多菲《自由与爱情》诗的译介	290
读学林版的几本全编诗	292
文求堂与《羽陵馀蟾》	296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成就与不足	300
《胡适书信集》的几点奇怪的差错	303
一次被搞错与被遗忘的文坛论争	305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争	312
两次“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会真相	326
《创造十年》杂考	329
《流氓与文学》在日本发现	338
郭沫若的一篇佚文	343
茅盾驳斥陈独秀	351
郑振铎在北平的两次演讲	357
叶紫悼念彭家煌	361
杨潮和他的《包饭作》	367
周作人化名攻击鲁迅之文	373
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	378
后记	381

鲁迅在民国第一天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鲁迅,这位民族杰出人物,在这一天做了些什么呢?今存鲁迅日记,是从这一年5月5日开始的。在已经出版的很多《鲁迅年谱》中,这天均无记载。即使最详尽扎实的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集体编撰的那本《鲁迅年谱》,这一天鲁迅的活动也是空白。而我在1936年元旦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八号孙伏园的散文《第一个阳历元旦》中,欣喜地发现了一点材料,特抄录如下:

民国元年的新年,我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

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

午饭以后,校长周豫材先生召集全校学生谈话,对于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末后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表庆祝;教务长范爱农先生还补充一句道:“诸位出去可以逛逛大善寺,开元寺。”

周豫材即鲁迅。孙伏园的这一回忆虽然很简略，但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及其老友范爱农）当时确实是以极大的兴奋喜悦心情迎接中华民国的诞生的。鲁迅不仅一得到消息便召集学生开会、决定放假庆祝；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最早论述了“革命政府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而孙中山是在第二天——1月2日才通电全国改用阳历的。

鲁迅最初接触的翻译作品

人所周知，鲁迅最早是在南京读书期间开始阅读翻译作品的。关于这，他在《朝花夕拾》的《琐记》中曾生动地回忆过自己当时读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情形。而他在谈到读《天演论》前，还说了这样一件事：他上矿路学堂的第二年，“总办是一个新党”，此人“坐在马车上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日本的一位认真的鲁迅研究者工藤贵正，特地去查了当年的《时务报》，发现那位“新党”总办出的这个《华盛顿论》的考题，原来正是从《时务报》上发表的译文《华盛顿传》而来的。鲁迅当时也看《时务报》，因此，这位细心的日本学者注意到鲁迅最早接触过这个翻译作品的细节；不仅如此，他还更认真对照研究了《华盛顿传》的原文和译文，从而进一步探索了这篇译作与鲁迅翻译活动的关系。这真是发人所未发，值得作点介绍。

《时务报》是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旬刊，由梁启超主笔，为近代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杂志。而《华盛顿传》译文发表于该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1896年8月9日）创刊号至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11月15日）第11期上（按：工藤原文中阴历历

换算有误,今已更正),连载三个多月,在当时应该是很有影响的。原著为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一生中最后也是最有名的杰作,写于1855年至1859年。译者是黎汝谦,字受生,贵州遵义人。《华盛顿传》原书共有199章,加上附记,共200章;而黎氏缩成76章(但实际上,《时务报》上只刊登了前9章便停载了)。

黎译以《序文》、《凡例》、《目次》、《本文》四部分组成。《序文》叙述了翻译此书的原委,并谈及翻译工作的不易。工藤认为,鲁迅后来发表翻译作品时,也总是加上序文,形式与此很相似,这是与他最初接触翻译作品时便读过这样的序文有关的。黎氏的《凡例》论述了翻译此书的方法,如职官名、地名如何翻译等等。工藤认为,从中可以看出黎氏的翻译态度,即为了让中国读者易懂,同时力求不使原著的内容有损。而这种认真的态度,应该说也是对鲁迅有影响的。《目次》列出了76章的题目,工藤经过与原著对照,发现黎译的题目有照原文直译的,也有自己重新组织而意译的。

工藤又抽取了译文中的一段文字,与原著相应部分作了对比研究,发现黎氏对原著还是相当尊重的。虽然有节译、意译的地方,但也有直译的地方,可以窥见译者的苦心。在当时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内,国内译界大多不大尊重原著,因而黎译还是令人瞩目的。黎氏的《华盛顿传》1896年发表,而严复的《天演论》于1898年发表,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发表。工藤认为,在当时当然是严复的和林纾的翻译作品对鲁迅影响最大;但黎译《华盛顿传》在翻译形式上看,也是很重要的,鲁迅后来的翻译都偏重直译。

住在鲁迅家的日本少年

1923年早春，有一个日本少年因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关系，曾在鲁迅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此人原名叫米田刚三，但在鲁迅的日记中没有出现他的名字（周作人当时的日记中也没有），因此，所有的鲁迅研究文章中也从未提到过他。不仅如此，即使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以前也谁都没想到他与鲁迅有过这么一段缘份。而此人却是90年代犹健在的著名国际社会活动家、美国共产党党员、日本工人运动理论家。

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于1906年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1913年回日本，后入广岛中学读书。在16岁那年，由于崇拜爱罗先珂，竟一个人到北京来找他，因而住在爱罗先珂处（即鲁迅家）二个月（按：最多不超过二个月，详见下述）。1926年回美国，参加工人运动。翌年，参加共产党。因崇敬卡尔·马克思而改名为“卡尔·姚乃达”（按：“姚乃达”即“米田”的日语读法）。1933年，担任美共的日语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主笔。1942年至1945年，进美军情报部，参加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工作。1957年，任国际装卸工人、仓库工人组织的负责人。1983年，获旧金山市荣誉奖章。主要著作有《美国日本工人史》（1967）、《美国的另一面》（1978）、《奋斗——美籍日人革命家60年的轨迹》（1983）等。

关于他少年时代来到北京并住在鲁迅家里一事，在上述他的自传著作《奋斗》(英文版1983年出版；日译本1984年六月书店出版)中也有记述。书中回忆说，在他十五、六岁时，对他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卢梭、克鲁泡特金，还有就是爱罗先珂。爱罗先珂用日语写作的童话深深地感染了他。当他得知爱罗先珂被日本当局驱逐而去了中国北京时，便不顾一切，连家里母亲都没告诉，就一个人离家去找他崇拜的人了。他身无分文，一路靠打工糊口和挣旅费。在下关，他为乘船到朝鲜，曾在码头上当过煤炭装卸工；到朝鲜的釜山后，又在玻璃厂干过活；在中国的沈阳等地还卖过香烟。就这样，经过四个月，终于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并找到爱罗先珂。后来，爱罗先珂让他帮助记录其口述的童话，并付给他报酬，让他作为旅费回到日本。

日本的鲁迅研究者藤井省三为研究“鲁迅与爱罗先珂”这一专题，曾特意去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调查有关档案。在一份当年日本密探跟踪爱罗先珂的秘密报告中，查到了“来北京的广岛市中学生米田”的记载，可以证明上述米田的回忆是可靠的。藤井后来还与美国的米田直接通过信，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米田信中说，他当时是因为读了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天亮前的歌》而着了迷。他从广岛出发的时间大约是1922年11月，至翌年2月中旬(按：当是2月下旬或3月上旬。因为据周作人日记，爱罗先珂直到2月27日才从上海归来)，他到北京大学找到爱罗先珂，对爱罗先珂说：“如果找不到您，我将把《天亮前的歌》一书中您的像片撕碎了咽下肚子，然后去自杀！”但是，爱罗先珂开始担心他是日本当局派来的特务，所以只将他带到在北京的日本牧师清水安三的家中。过了两天，清水夫人证明他是一个诚实的爱好文学的少年，爱罗先珂才将他带到自己的住处(即鲁迅家)。后来，他约用一个月的时间记录爱罗先珂口述的《红的花》(这个童话，鲁迅不久在4月21日译成中文)，发表于7月号《小说月报》上)。这期间，他还曾同爱罗先珂

一起,与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台湾革命青年等接触过。1923年4月16日,米田与爱罗先珂乘同一列火车离开北京,米田到天津乘船回日本,而爱罗先珂则沿海岸线北上去莫斯科。

米田住在鲁迅家里时,虽然单独住一间房间,但是肯定会遇见鲁迅的。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文章和书信中却一点也未能谈到鲁迅。藤井写信去问他,他说自己当时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所以现在只是朦胧地记得见过周作人的日本夫人,其他的人都记不得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应该记入鲁迅及周作人的年谱中去的。

“左尔格事件”与鲁迅日记失踪之谜

众所周知，鲁迅的日记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宪兵队逮捕许广平时曾被搜去。两个星期后许广平获释，取得归还的鲁迅遗物中便缺少了1922年整整一年的日记。

鲁迅的日记为什么恰恰就失踪了这一年呢？它们还可能存在于天壤间吗？——这是几十年来热爱鲁迅的人们所最关心的事情。日本的鲁迅研究者藤井省三在其《近百年中国文学》一书中《失踪的鲁迅日记》一节里，对此提出了一些猜测，颇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藤井认为，许广平的被捕和鲁迅日记的被搜，可能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佐尔坎事件”有关（按：佐尔坎，今通译为左尔格，是共产国际的谍报人员，1941年10月被日本军方捕获）。当时，与这一事件有牵连的以尾崎秀实为首的外国记者（如已故的山上正义以及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都曾与鲁迅有过密切的联系。而日本宪兵抓许广平后，便查问鲁迅与日本人的关系。于是，藤井便提出了一个思考的线索：鲁迅1922年的日记，是否与1941年当时的那些日本人有关？

例如，有一个名叫福冈诚一的日本人，1922年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因为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关系，曾在鲁迅家里住过二个

多星期(按:新版《鲁迅全集》日记卷的人名注释中说他是1923年住鲁迅家,实误)。此人大学毕业后进日本同盟通信社当记者,后曾驻上海工作,常与鲁迅来往。如1929年8月8日鲁迅日记记有:“福冈诚一来,谈至夜半。”1933年8月31日又记有:“晚福冈君来”等。藤井认为,此人是私淑日本社会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的自由主义者,在发生“佐尔坎事件”时他受到日本军部的注意是很有可能性的。

再如,也是因为爱罗先珂的关系而在1922年与鲁迅经常交往的牧师清水安三(1891~1988),他在1941年7月刚从美国募捐得到一万美元回到北平,便被北平的日本宪兵队盯上,在一个月內几乎每天都被传讯,最后以强迫吐出大半美元而完事。藤井认为,北平与上海的日本宪兵队之间当有密切联系,而清水又喜欢对时局随便发表意见,他在当时也很可能受到军部的注意。

总之,藤井认为1922年正是鲁迅与日本人交际特别多的一年,在二十年后发生“佐尔坎事件”之际,日本宪兵队为了要对记者们和自由主义者加紧压迫,很可能想从1922年的鲁迅日记中寻找某些日本人的材料,而这,便可能是这年日记失踪的原因。许广平的回忆中曾提到当时审讯他的日本人“佐佐木德正”、“奥谷曹长”等名字,藤井希望日本有关人员能有勇气提供线索。

大夜·璧月·饕蚊

许杰先生在《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中生动地记述了鲁迅自己对《唐宋传奇集·序例》中结尾的“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的解释：“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高长虹自称是太阳，说景宋是月亮，而我呢，他却谥之为黑暗，是黑夜。……”有人认为，这是很新鲜的解释，如果不是许杰先生把鲁迅的话写出来，那么就谁也不知道了。其实，这样的解释并不是第一次披露，许广平先生生前至少说过两次，不过写得较为含蓄，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一次是1937年1月1日《热风》杂志上，许广平发表《我怕》一文，在文末，她深情地说：“遇到月亮，那月光和室外的灯光交映着来临，他，就时常欢喜说一句：‘今天月亮真好呀。’他的称赞月亮，似乎在厦门（按：当是广州）写文章自比于黑夜之后。但是，以后的月亮，只能跑到他墓前，发出凄清的寒光，却没有法子和他见面了！”另一次是1941年10月《学习》杂志上，许广平发表《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文中提到：“因为我们一同乘津浦车南下便引起了流言，甚至因之有人（按：指高长虹）以此对鲁迅加以攻击。那么，应战就是了，我绝不会在此时竖出反叛之旗的。……于是在《唐宋传奇集》序例的末行，有似‘春秋’笔法的几句，为鲁迅先生自认是得意之作的……”

鲁迅和沈尹默

遵命文章语最工，望中依约大旗红。
辕南辙北日以远，终与洪流汇海东。

这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沈尹默先生在纪念鲁迅先生时写下的一首诗。沈尹默和鲁迅早就是“平日往来、极其熟识的朋友”。辛亥革命以后，沈尹默便认识了鲁迅。鲁迅在1912年5月到北京工作，翌年，沈尹默也到了北京。从《鲁迅日记》上来看，他们最初是在许寿裳先生举办的宴席上见面的；第二天，沈尹默便特地到鲁迅的住所拜访。当时，鲁迅和沈尹默同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他们住处很近，过从密切。有时，鲁迅在元旦等佳节，还请沈尹默吃饭。鲁迅到章太炎老师家去，偶然也遇到沈尹默。鲁迅当时竭力编辑并自费刻印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出版后，也赠送给沈尹默。

不久，新文化运动开始。鲁迅站在运动的最前头，沈尹默也投身于其中。《新青年》创刊了，鲁迅和沈尹默都担任了编委。他们一起提倡白话文，激烈地反帝反封建。鲁迅写了许多震撼当时的杂文和小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一出版，即赠给沈尹默一册。而沈尹默是最早尝试写新诗并取得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经常